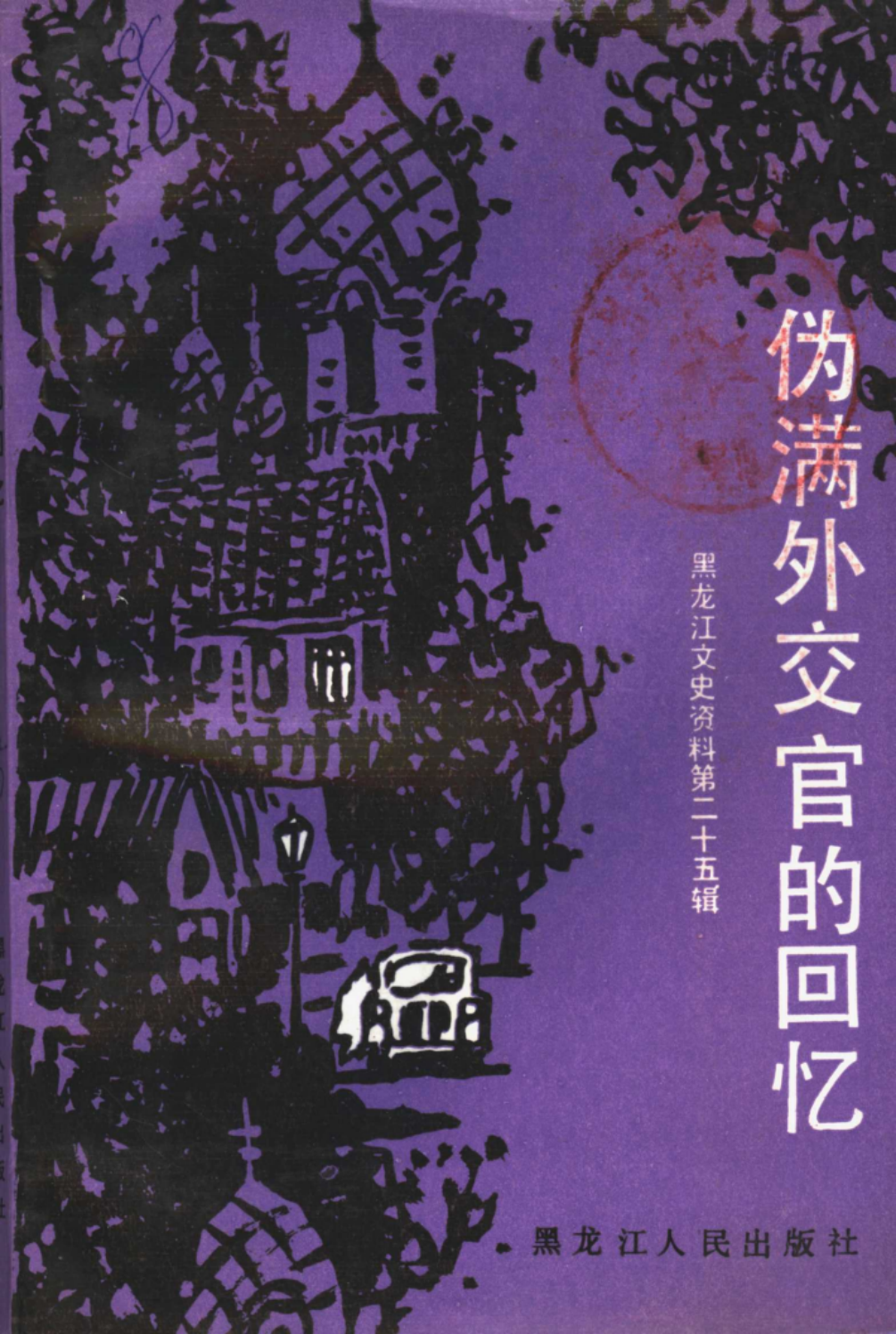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王替夫口述 金淑梅整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陈 健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水利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4 13/16字数 110,000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7-01205-5/K·101 定价：1.36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王替夫先生，吉林省永吉县人。生于1910年，已届78岁高龄。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14年中，他历任伪满洲国驻赤塔公使馆雇员、书记官，伪满洲国驻柏林公使馆书记官，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曾陪同伪满洲国公使先后向德国、丹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递交国书。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伪满洲国傀儡外交的历史见证人。

王替夫先生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公诸于世，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伪满外交内幕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互相勾结，一些附庸国家屈服并纵容法西斯势力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史料。

由于年代久远，追忆难免有误，望知情者指正。

目 录

学生时代.....	(1)
开办“翻译事务所”	(3)
慰问马占山.....	(4)
被捕入狱.....	(8)
生死关头.....	(11)
踏上了与侵略者为伍之路.....	(14)
出使苏联.....	(23)
初到赤塔.....	(26)
“保护”中国侨民.....	(30)
南京领事馆.....	(32)
收买梁秉堂.....	(32)
升任书记官.....	(34)
“何庭芳风波”	(35)
领事的“家事”	(37)
警觉的苏联人.....	(38)
新领事上任.....	(39)
庆祝溥仪登基.....	(30)
间谍——外交官.....	(41)
“满洲里会议”前后.....	(44)
粉饰侵略.....	(44)
累死也得不到主子的信任.....	(45)

在大连伪满外交办事处·····	(47)
出使德国·····	(50)
沿途见闻·····	(53)
车到柏林·····	(62)
向希特勒递交国书·····	(65)
向完全军事化发展·····	(67)
争夺东北大豆·····	(70)
考察法国·····	(71)
难忘的巴黎老人·····	(73)
二次大战前奏曲·····	(75)
中国人在德国·····	(78)
汪精卫驻柏林总领事馆·····	(80)
反共同盟·····	(81)
说服刘福顺·····	(82)
出使欧洲诸国·····	(83)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	(92)
犹太人的遭遇·····	(93)
撤回国内·····	(95)
溥仪召见·····	(101)
“别忘了，你是中国血儿”·····	(103)
越格提升·····	(104)
挚友古海忠之·····	(104)
末日溃逃·····	(106)
光复前后·····	(112)
协助苏军整顿治安·····	(115)

逮捕张景惠等伪满要员·····	(119)
任命曹肇元·····	(121)
战争胜利纪念大会·····	(123)
国民党来了·····	(124)
可敬的喀尔洛夫·····	(129)
为蒋介石祝寿·····	(131)
蒋经国接见·····	(133)
被捕入苏·····	(135)
顽固不化·····	(147)
狱中骚乱·····	(149)
获释回国·····	(152)
新生·····	(154)
归宿·····	(155)

学 生 时 代

我出生于1910年，老家是吉林省永吉县黑山嘴子屯。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辈有兄弟姐妹10多个，成家后都住在一起，总共有七八十口人，以务农为生。

在我刚刚记事时，父亲就离家跑买卖去了。

我7岁那年进了私塾，10岁时，父亲将我们母子接到了他的住地吉林省吉林市。在那里我念完了高小。后来父亲与人合伙办起了林场，办公地点设在哈尔滨，这样，我们举家又迁到了哈尔滨。我考入了东省特别区第二中学，这是1922年。

我在小学学的是英语，已达到了能写一般书信的程度。上中学后改学俄语，在学俄语的问题上，父亲是大力支持的。因为那时候，在中东铁路工作的大多数是俄国人。父亲办林场搞运输需要和他们打交道。可他不懂俄语，雇一个翻译，每月要花掉一百多块哈大洋。而且还不是坐班制，只是谈生意时才请来。善于经营的父亲当然认为这是划不来的事。父亲也清楚，谈这样的事，只有自家人最可靠。因此，希望我尽快成为俄国通，帮他一把。

我一接触俄语便好喜欢，而且还有一股灵气。因而，学的相当快，周围的不少同学见了都大为惊讶，老师也很赏识。

14岁，我在东省特别区第二中学毕了业。当年，我是一心思想学文科，私塾教育使我偏爱文学。但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他曾郑重地找我谈了多次话，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学工。他语重心

长地教导：“孩子，咱们是商人，实业家，学工凭技术，有饭吃，学了文，官场中咱没有人，将来没出路。”这话在当时不无道理，也可以说是父亲半生漂泊生涯的总结。但我毕竟年轻，不知道仕途道路的艰辛，对父亲的话还没有过深的理解。所以，一直在犹豫，也痛苦过，心里还抱怨父亲不该干涉我自己的事。其实，父亲的心思我是明白的，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而我的数学基础不好，学工自然会很吃力，再说我的心思又不在这方面，……思来想去，出于不忍心让父亲失望的想法，我按着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哈工大的预科。

当时的哈工大创建不久，很正规，刘哲为名誉校长，白俄吴索夫为教务长。办学方针都是俄国式的，老师们讲课用的教材也多以俄文为主，由于我的俄语基础打的好，因此，学习进展较快。

上预科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生运动，至今想起来还激动不已。

当时，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在满蒙敷设五条新铁路密约”，答应日本可在东北再修筑五条铁路，消息传到哈尔滨后，爱国的学生们被激怒了，认为这是有辱国格的大事，大中专的学生全都动员起来，自发地成立了领导小组，我们买了一些彩纸做成小旗，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1928年11月5日上午，共有各校学生2000余人集结在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现哈尔滨铁路二中）门前请愿，然后开始游行示威，向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出发，沿途高呼口号，并散发传单，后来遭到警察镇压，这次抗路运动持续了好几天。

18岁，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考取了东省特别区法政大学。

我之所以选择法律，原因很简单，当时政界腐败，做官的胡作非为，吃喝玩乐，说小婆子。这都是我所看不惯的，又无能力改变。很自然地想法是不当官，但可以做法官，做一个清廉的法官。

再一次当学生，又是自己选的专业，让我好兴奋。

我学的是政治经济系，开始时，课程是很多的，老师留了许多参考书目，其中大多是德文和日文的，而这两门外文课我都作为专修课选了，所以在看参考书时并不觉得很吃力。

开办“翻译事务所”

到大学三年级，我们的课程逐渐少了，后来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自习。那时，人们管法官叫推士，一天，一位比我早毕业几年，在东省特别区地方检察院谋事的姜推士找到我说：“老王，你们下午有时间了，给你找点活干怎么样？”

我听了当然高兴，因为自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我的家是个老式家庭，尽管父亲从商，家里并不缺钱，但他却是个古板的老人，对我要求很严，从不多给一分零花钱，就是我平时的穿戴，家里也常常限制。中学毕业前，我一直剃着光头，到了大学，父亲才准许我留平头，每月给一角剪头钱。

姜推士给我介绍的差事是为一些打官司的俄国人当笔头翻译。这确实是挣钱的好买卖。那年月有不少打官司的俄国人，因为中国的法官们大多不懂俄文，因而，需要有翻译。在姜推士的帮助下，我在法院门前租了个小棚子。与同学张柏涛一起办起了

翻译事务所。

生意是很兴隆的，我们每天接待着络绎不绝地拿着“呈子”的俄国人。规定的价格是：稿纸一行一角哈大洋，每个上诉的“呈子”都有五六篇稿纸，一篇30多行。翻译完了，还必须打成铅字。开始，我们雇了个白俄姑娘打字，后来有钱了，自己买了一台俄文打字机，我的打字技术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第一个月下来一核算，每人纯收入有180块哈大洋。到后来，最高时的收入每人每月200块哈大洋。

有了钱，不但学杂费可以不用向家里要了，还添置了一些时兴的穿戴。西服头一次上身时，心里真是喜洋洋的。

我发财了，父母很惊讶，以为我的钱不是从好道上弄来的。我好委屈，讲出了原委。并一再声明：没有半句谎言。父母将信将疑。第二天，父亲放下自己的工作，按我说的地址到了我们的翻译事务所，亲眼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才放下心来。

记得当时家里雇的大师傅很羡慕我。他说：“少爷，你20多天就拿回200块哈大洋，我们是比不起，看来还得念书呀！”

慰问马占山

1931年，就是我大学毕业的头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占领沈阳后，迅速逼近长春。吉林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向日军投降。日军兵不血刃开进吉林。熙洽就任伪吉林省军政长官。辽宁、吉林沦陷后，哈尔滨风雨飘摇。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哈尔滨的大中专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每个学校都自发地成立了“反日会”、“反日同盟”等。我们法大学生也在校内召开了讨论会，气氛热烈激昂。发言的同学慷慨陈词，一致抗议日本无视国际公法，野蛮侵略我东北。

此时，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将军率部在嫩江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保家卫国的浴血之战。

马将军的英雄行为，得到了全国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各界纷纷行动起来，上街捐款，支援战斗在前线的将士们。

我们法政大学也沸腾了，学生们上不去课了，拿着铁罐头盒子，加入了上街募捐的行列。我们编了好多小组，分别到不同的街道。我被派到道里沿江一带的募捐小分队里。我们一边走，一边宣传抗日的意义和马将军及部下的英雄事迹。人们纷纷向我们涌来，凡遇到的没有绕着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拿着一枚铜币，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只这点钱，拿去抗日吧！”

当时，我们在场的几位同学都感动地给他鞠了一躬。

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因为没钱，跟在我们后面走了好远。终于看到围着我们的人少了，急忙过来，摘下自己的手套：

“兄弟，我没钱，把它拿去吧！”

一位做买卖的商人拿来许多钱，让我们告诉马将军：“先有国，才有家。”

这些，都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被深深地感染着，激动着，一连好几天吃不香，睡不着。

就这样，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全市就捐赠了近2万哈大洋和上万件的衣物。

我们迅速成立了11人组成的代表团。成员呢，有两个我们政法大学的学生，三个哈工大的，两个东省特别区第二中学的，一个一中的。

我们买了大量的毛巾、烟卷、水袜子（高筒胶鞋）、冰糖等慰问品，用专车发往马将军的驻地——齐齐哈尔。

我们代表团连同哈尔滨国际协报记者一起随车前往。省公署专员派车到齐齐哈尔火车站接我们。一见面，我们就把急于见到马将军的要求提了出来。

专员很和善地安慰我们：“一切都有安排。”

于是，用车把我们拉到了齐市龙江饭店（那是当年齐齐哈尔最好的宾馆）。

一路上，我们看到大街上贴满了标语：“拥护马主席，保卫黑龙江”（马占山当时是黑龙江省代主席）。

晚饭是很丰盛的，听说马将军让好好地招待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学生。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来到了省公署。马将军部下的刘副官出来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让到议事厅里。

他说：“各位先等一下，马将军很快就出来。”

坐稳后，我看到议事厅的墙壁上挂有孙中山的画像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上午10点，马将军出来了。只见他中等身材，50岁左右。穿着半新的长袍，秃头，高鼻子，瘦脸，留个小胡子，两眼深陷，但很有神，使人感到他刚毅，坚强。

他一出来，我们马上站了起来，鼓掌迎接他的到来。马将军显得很兴奋，他看到我们站着，便向大家招手让坐。说：“大家

辛苦了。”

我们马上回答：“将军是最辛苦的。”接着，马将军对我们的爱国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对我们大老远地赶来送慰问品表示感谢。然后，马将军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致内容是：“沈阳的一声炮响，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我马占山为何抗战，只因中国有句俗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了，如果再举手投降，有辜负军人的天职和百姓的希望。为此，我们全军将士要抗战到底。”

这番话对我们大为鼓舞，令人激动不已。顿时，马将军成了我们心目中英雄的化身。大家纷纷要求参战。到前线去！成了我们的共同心声。马将军一再安慰我们：要安心读书，因为枪支弹药不多，学生来了也用不上。你们在后方好好学习，也算是对我们的支持了。

参战的要求满足不了，我们又提出到前方看看，把慰问品亲自送到前线将士的手里。马将军看到我们这样心切，又是如此诚意，就答应了。但一再嘱咐：一道、二道防线不能去，只许到第三道防线。

最后，国际协报的记者为我们和马将军合了影。

照片随后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发表，我们也都成了新闻人物。

在龙江饭店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我们一同坐上了特为代表团准备的大卡车，前往齐齐哈尔的南大门——昂昂溪前线慰问。

那正是深秋时节，天气已很冷了。尽管穿着棉衣，但凉风袭来，不由地打着寒噤。下午3点多钟，我们来到第三道防线。战

战士们有的头戴皮帽，有的却衣衫单薄，还有的披着毯子，但士气高昂。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当我们把慰问品分发到战士手里时，他们热烈地同我们拥抱，这时群情振奋，欢声四起，战士们喊着：“多杀鬼子，保卫国土！”“中国万岁！”

在战壕里，一位叫金典戎的连长向我们介绍了几天来的战况和战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金连长当时二十四、五岁，是位中学毕业生。他一双眼睛挺大，左脸上有块很明显的伤疤。他的讲话大大激发了我们的情绪，纷纷拿出自己随身带来的笔记本，请他签名留念。

被 捕 入 狱

日军侵入哈尔滨后，便开始以哈市国际协报过去登载的哈市学界代表与马占山将军合影的照片为线索到处抓人。

此刻灾难正在悄悄地降临。一天深夜，我和家人都已熄灯睡下了。突听得“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好急，不容你有一丝怠慢。再加上夜晚的寂静，这突来的声音令人感到很恐惧。同时，我也预感到：出事了。猛地从床上跃身起来，一旁的妻子也醒了，拉着我的衣襟，颤声地问：“替夫，发生什么事了？你不会有事吧？”

我顾不上多解释，一下蹦到地上。隔壁的父母也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我一边系着衣扣，一边朝门口走，还连声应着：“来了，就来了。”门仍然“咚咚”地响着，但我听得出来，外面的人早已经不耐烦了。

门开了，一群日本人领着一个朝鲜翻译官闯了进来。他们带着刀、枪，满脸的杀气。一进屋，就四散站开，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上下打量着我的家里人，然后冲着我没好声地说：“你是王替夫吧？”

我说：“是的。”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进不去，只是机械地回答问题。

还没等我说第二句为自己辩解的话，日本军官一挥手，上来两个日本特务，用黑布蒙住了我的眼睛，连推带拽往外拖。家里人一见这阵势，吓坏了，孩子大哭。父母上来，一再肯求：“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吗。”他们哪管这些，不容分说，把我弄到了一辆停在门口的汽车里。

就这样，我被关进了设在道里的日本监狱。后来听说，和我同时关进来的有不少人。

进来的头两天，我还存有侥幸心理，以为日本人没有抓住我的把柄，不会出什么大事，只不过关起来吓唬吓唬罢了。那时，唯一担心的是父母、妻子，怕他们挂念我，再急出什么好歹来。因而，整天唉声叹气，送来的饭一口也咽不下去，直嚷嚷放我出去。

直到关押的第三天下午，才进来一个日本军人。他中等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拿一个记事的本子。进来后，他先环视了一周房子，然后用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眼神盯了我好一会，弄得我很是不自在。之后，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似乎是卸下了一副什么重担，在我的身旁找了一个自认为是合适的地方坐了下来，并没急于翻开笔记本，而是用手漫不经心地敲打着本子，看上去并不很认真地同我唠了起来。诸如什么学校毕业，多大年

纪，学过哪些外语，家有什么人，父亲是做什么的，婚否等，我毫无隐瞒地回答了他的提问。

他一边问，偶尔记上几笔，那神态，并不会让你想到是在牢房里，倒好象是接受记者的采访。尔后，他稍微变了一下神色，语气严肃起来。他问我是否到齐齐哈尔去过，见到马占山将军都说了些什么。我马上否认自己去过齐齐哈尔。故意加上一句：

“您是不是弄错人了？”他嘿嘿笑了，用眼睛扫了我几下，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翻拍的照片，问：“这是谁？王先生，不会不是您吧？”他又说：“告诉你吧，你们这些人都在这里呢！”他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你们做的事，我们都清楚。”不容你回话，他接着又说：“人家可都老实交待了，希望你呢，也有一句，说一句，不要向皇军说谎呀！”

我低着头，心有点乱了，放在膝上的手也不由地抖了一下，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是啊，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日本军官见我吭声，又拿出了我写给李顿那封信的影印件，紧逼一句：“这是你干的事吧？！”

都很明白了，我做的一切，日本人全掌握，我的心紧缩了。

“当然”，日本军官站起身，来回地在地上走着，变得和颜悦色了：“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知道吗？”他挥了一下手，“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将来，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你会日语，又是大学生，要你呢为新国家做点贡献。如果同意，我们就把你放出去。”

为日本人办事，这是我不能答应的。记得在日本军未到之前，同学们就有约在先，谁也不给日本人效力，否则没有好下场，抓不着你，你家也好不了。